



中国社会科学院老学者文库

古史论丛

陈绍棣◎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中国社会科学院老学者文库

古史论丛

陈绍棣◎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古史论丛 / 陈绍棣著. —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6. 7
ISBN 978 - 7 - 5161 - 8056 - 3

I. ①古… II. ①陈… III. ①中国历史—古代史—文集
IV. ①K220. 7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84377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宋燕鹏
责任校对 王佳玉
责任印制 戴 宽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 //www. csspw. cn](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三河市君旺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6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32. 5
插 页 2
字 数 428 千字
定 价 118. 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 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一

张岂之

今年二月我收到陈绍棣同志的来信，感到亲切，引起了我的回忆。1964年冬我随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今属中国社会科学院）到山东海阳县参加“四清”。当时，绍棣刚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毕业不久，分配到历史研究所做研究实习员，随着下乡锻炼。从年龄看，我是属于“老师”辈的人，在“四清”中似乎没有师生辈分的划定，一律平等，我和绍棣经常谈些关于学术研究方面的事。除我们两人外，绍棣的一位同学王宇信也来参加“四清”，一起闲谈。当时在我们心里埋藏着一个想法：“四清”毕竟是短期的事，我们迟早会回到学术研究的岗位上去，事先做些谋划是必要的。

后来我们多年不见，绍棣一直在历史研究所师从著名史学家张政烺先生，主要研究春秋战国史兼及秦汉史，涉猎过宋史，对明清史也作过研究，撰有《中国风俗通史·两周卷》。与其他学者合作有《中华文明史》《中国审计史》《中国经济通史·秦汉经济卷》《中国古代建筑技术史》《中国饮食史》。又协助张政烺先生编著《中国历史文物图集》。绍棣在历史研究所历任研究实习员、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研究员，2000年退休，仍从事研究。绍棣数十年如一日，在史学研究的园地上辛勤耕耘，作出了贡献。

绍棣退休后整理他写的文稿，选出 38 篇，名《古史论丛》，准备出版，要我写一篇序言。说实在的，我不敢为绍棣的《古史论丛》写序，因为他精深研究的课题我没有研究过。转而一想，我们在几十年前，不止一次地交谈过关于史学研究方面的问题，作为一个美好的记忆，看到绍棣精心写出的书稿，我应当写一些我想说的话，哪怕是外行话，为绍棣的书作一点介绍，是不可推卸的。

绍棣早有这样的观点：学者的文章不在数量多少，主要应看质量。本次拟出版的《古史论丛》，分上编（人物）、中编（城市）、下编（风俗），而这三编准确地勾勒出绍棣学术研究所涉及的三个主要方面。

这三方面论文的特点在于“精”，而“精”的标志在于有新见；这体现了作者将考古学与历史学融合起来，具有较深的研究功力。例如，在《试论王莽改币》一文中，将文献材料与考古材料相印证，探析王莽改币的背景、内容、性质和失败的原因，试图通过对西汉后期货币发展的研究，找出“规律”来。与此相联系，绍棣在《王莽改制若干问题商榷》一文中，就学术界已有的论点进行探讨，即评价王莽的依据，对《汉书》等古籍中贬抑王莽的记载、王莽改制的动机、王莽改制的性质和王莽改制失败的原因等，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在《人物》中，绍棣对明代建筑家进行了研究，其中有一篇，题名《论徐杲——兼及明代的匠官》，认为在中国中古时期传统社会中，以工匠身份而被拔擢为工部尚书的，只有明朝徐杲一人，分析他脱离匠籍、进入仕途的原因，澄清他受诬陷、被罢官的冤案，这对于研究明代的科技史和政治史有一定的参考意义。与此相关，绍棣在《试论明代从工匠中选拔工部官吏》一文中，分析明代为何从工匠中选拔工部官吏，是否已形成制度，对此制度应如何评价等都有所评论，给人们以启示。

与上面相联系，在《人物》中还有一篇名为《明代的油漆名匠——兼及明代油漆技术的发展》，对明代油漆名匠张德刚、杨坝、黄成、杨明、周翥作出评析，这些有助于人们对明代科技史的理解。

绍棣《古史论丛》中编为“城市”，收有论文12篇，凸显了学术研究的广度。如果没有广度，缺少不同类型研究对象的相互比较，深度也会失去依据。总之，广度与深度的内在结合，这是绍棣《古史论丛》的又一特色。

《跨湖桥文化内涵刍议》一文探讨跨湖桥的年代、彩陶、独木舟、社会面貌以及在学术史上的意义，使人对跨湖桥文化有了比较全面的认识，有一些新观点。

再如《登封王城岗城堡遗址时代试探》一文，从地望、地层关系、时代特色、文化性质等方面论证王城堡遗址可能是禹都阳城，还指出都城、档案库、王陵的探寻、发掘和研究，应成为今后夏文化探索的重点，这些都是有价值的学术献言。

《古史论丛》中关于战国时城市研究有四篇论文，我个人想法是：除《浅谈春秋战国的城市环保》略显逊色外，《略论战国城市与政治、经济和军事的关系》一文，已经不限于“略论”，对那时的城市与政治和军事的关系，以及与工商业互为条件的论述，都有相当的学术深度，是古都研究中有代表性的文章。至于论文中提出的战国城市有郡县城市与工商业城市两种类型，以及战国时诸侯国都城奠定了我国古代都城的基础，都是有说服力的论说。

《战国都城城防体系刍议》是一篇值得关注的论文，它从六个方面论述战国都城城防体系，即都城的选址、形制、规模和市里，都城城墙的形制和构筑材料，都城城墙的纵深配置，都城城墙上的作战设施，城墙重点部位的加固，都城郊区要道上的前哨据点。这些论点虽然不是首次提出，但绍棣将已有成果加以归纳，形成一个整体，使读者关于我国都城城防体系有了比较全面的认识，

在学术上有归纳之功。

我还想提到《古史论丛》中《汉画所见汉代城市与政治、经济和军事关系》一文，关于城市如何促进边境上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经济交流，从而促进了文化和政治的联系以及不同民族间的融合，文章有深度，看后觉得有所得。我读了这篇文章，使我想起20世纪80年代带领学生到陕北进行文化考察的情景，其中对汉画像石的认识又提高了一步。

《古史论丛》中《文源阁与〈四库全书〉》一文将文献记载与实地调查材料相印证，参考当代学者的研究成果，作为恢复被八国联军侵略者焚毁的圆明园文源阁原貌的尝试，是有意义的。

绍棣《古史论丛》下编为“风俗”。

何谓“风俗”？清初大学者顾炎武说：“风俗者，天下之大事。”（《日知录》卷十三“廉耻”条）因此，“论世而不考其风俗，无以明人主之功”（同上卷十三“周末风俗”条）。所谓“风俗”，包含社会舆论、士人道德、吏风、民俗等方面，这些都是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绍棣《古史论丛》“下篇”对先秦、秦汉时期的“物质文明”，当时汉族和少数民族衣食住行、日常用具、风俗习惯都有比较详细的分析，使人感受甚深。但我也觉得关于“风俗”的论述尚缺乏当时精神文明方面的简要论述，因而稍显不足。

我和绍棣认识至今，他给我的印象是：沉默寡言、谦虚谨慎、从不显示自己。从他的研究成果方面看，我们又看到他是如此勤于思考、勤于吸取其他学者的长处，又勤于提出自己的独立见解。总之，绍棣是一位严谨的史学家。我衷心希望他的著作《古史论丛》能得到史学家们的准确评价。

张岂之

2015年3月4日

于西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

序 二

朱绍侯

陈绍棣先生的《古史论丛》即将出版，除了已发表的十部论著（三部独著，十部合著）之外，这是他几十年来在史学研究领域又一项研究成果，值得珍视。在学术界似乎有重视专著而轻视论文集的倾向。据我所知有些高校和科研单位，只许专著评奖，不许论文集参评，即使参评，也难于入选。我认为专著自然有它的学术价值，但专著的每章每节不可能都具有独到见解，也不能都属于作者自己的研究成果。他广泛吸收学术界的研究成果，再加上自己的研究心得和见解，才能写成一部书。论文集集中的文章，自然也要吸收学术界的研究成果，在每篇文章中必须有所创见和新意，否则有影响的刊物是不肯发表的。对于绍棣同志的《古史论丛》，我虽然没有深入研读，只粗读一遍，但觉得他的论文都有新见，是根据历史文献和考古资料而得出的结论，是自己的研究成果，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和参考价值。

绍棣同志的《古史论丛》分上编“人物”、中编“城市”、下编“风俗”。对上、中、下三编中的论文作出评介，既不可能也无此必要。我只想在三编中各选三篇论文而略抒己见，以展示《古史论丛》的学术价值。

一、上编“人物”。（一）《秦国重农政策简论》。本文是根据

《史记·商君列传》《商君书》有关商鞅变法所建立的《秦律》与云梦出土的《秦律》进行比较研究，认为商鞅变法时所建立的重农政策，在云梦秦简中得到印证，且有所丰富和发展，并日益严密和完善，指出商鞅死后秦法未变，秦国的奴隶仍大量存在，反映了秦国的初期封建制的特征。（二）《试论王莽改币》。本文利用历史文献与考古资料相互印证法，来探讨王莽币制改革的社会背景，改革的内容、性质及失败原因等问题，并试图通过对西汉后期货币演变的考察，初步探讨我国封建社会早期的币制发展规律。本文如与下一篇《王莽改制若干问题商榷》合读，对王莽改制的动机、性质及失败原因，就会有更深刻的理解。（三）《论徐杲——兼及明代的匠官》。本人对明史并无研究，也未见明史专家对徐杲的论述，读了绍棣同志的《论徐杲》，才知明代还有一位工匠出身的徐杲当上了工部尚书，这是明代的奇迹。绍棣同志在本文中，总结了徐杲在建筑和水利工程上的成就，并分析了徐杲脱离匠籍、超登仕途的原因，对研究明代技术史、政治史都有特殊意义。本文如与下一篇《试论明代从工匠中选拔工部官吏》连读，对明代选官制中从工匠提拔为官吏并未成为常规的深刻原因，对了解明代选官制度标准，更有明确的认识。

二、中编“城市”。（一）《略论战国城市与政治、经济和军事的关系》。本文的重点是以当时的政治、经济、军事为核心，论述战国城市兴建的重要性，并得出以下三点认识：1. 战国城市的形成与发展适应了当时政治、军事的需要，并与经济发展，主要是工商业的发展，互相促进；2. 战国城市有郡县城市与工商城市两种类型；3. 战国诸侯城市建设，奠定了我国古代都城的基础。（二）《汉画所见汉代城市与政治、经济和军事的关系》。本文利用画像石、画像砖和壁画等图像资料，结合文献记载，从城市发展与政治、经济、文化关系的角度来研究汉代的城市，得出以下三点结论：1. 汉代的城市建筑，主要是为维护和巩固封建统治服

务的；2. 汉代的城市结构及布局适应了当时政治、军事的需要，边境的城市对军事需要尤为重视；3. 汉代城市发展，为经济（主要是工商业）发展创造了条件，也促进了边境各民族间的经济、文化交流，“互市”就是民族友好的象征。本文资料运用方面颇为新颖，以画像石、画像砖来研究城市，实属罕见。（三）《汉唐长安规划之我见》。本文对汉唐都城长安的规划，从四个方面作了比较：1. 地理位置与自然条件之比较；2. 规模、形态之比较；3. 布局之比较；4. 城防设施之比较。指出唐代之长安较之西汉之长安，在规划、布局上确有明显的提高。这是对汉至唐八百年间，魏国邺城、魏晋洛阳、北魏前期平城、北魏中期洛阳等都城建设进行经验总结与继承的结果。唐代都城长安的规划、布局具有匀称、紧凑、分区明确、街道宽直、坊里整饬等特点，对唐代洛阳城的建设，乃至日本都城平城京（奈良）的建设都有深远的影响。

三、下编“风俗”。（一）《秦汉时期边郡社会物质生活初探》。本文从衣、食、住、行四个方面对秦汉边郡人民物质生活进行详细的研究，认为人们的物质生活与时代、地区、地形、气候、生态环境、物资生产、风俗传统都有直接关系，而同一个民族在不同时代，相同环境下，也可以有相当大的变迁，从中可以看到精神活动的轨迹，从这个意义上说，人们的衣、食、住、行与精神活动也有密切的关系。边郡人民是中国与域外各国、各族人民交往的中介，无论是陆上丝绸之路还是海上丝绸之路，边郡人民都起到了桥梁和纽带作用，他们都为创造秦汉文明作出了贡献。（二）《匈奴社会物质生活初探》。本文用二重证据法，从衣、食、住、行四个方面，研究了战国秦汉时期匈奴人民的物质生活，从中可以看到鲜明的北方民族生活特色，也可以看到中原文化、经济对匈奴族的影响。本文如与下文《百越与匈奴衣食住行之比较研究》参照阅读，更可开阔眼界，发现战国秦汉时期，南、北方少数民族物质生活的特征及差异，并看到其不同特征及差异形成

的原因。(三)《中国古代婆媳之礼初探》。本文参考当代学者的研究成果,将中国古代婆媳之礼归纳为七点。指出婆媳之礼规定婆婆和媳妇各自的等级名分和行为准则,尽管其中也有积极、合理的一面,如媳妇要孝敬婆婆,婆婆要爱护媳妇,但其主导方面则是充满了封建说教,是媳妇精神、实体上的桎梏。

以上所评介的九篇论文,并不一定是作者的代表作,这是根据我的兴趣而选择的篇章,但从中可以看出绍棣同志在选题和资料运用上别具一格,都是从别人不太注意的角度,根据自己所掌握的资料直抒己见,其中确有精辟独到之处。尽管他的某个见解不一定为学术界所认同,但直抒己见的精神是可嘉的,值得学界同人学习、参考。

我与绍棣先生是在多次史学研讨会上认识的老朋友。听他的发言,读他的论文,感到他史学功底深厚,学识渊博,所谈所论的内容充实,而不随波逐流,令人钦佩,因他是河南人,又多一层亲切感,所以交往就多一些。现在他的大作《古史论丛》即将出版,向我索序,我当然先读为快,读后写几点心得体会,权作小序,并向绍棣同志表示祝贺。

朱绍侯

2015年3月9日

于雏飞书屋

前 言

我出生于河南省唐河县井楼镇一个破落的知识分子家庭。因为家境清贫，所以从小经常参加劳动，没有多少时间念书，学问基础较差。但因县里出了冯友兰、冯景兰、冯沅君、徐旭生、李季等文化名人，使我萌生了学习他们，为家乡争光的理念。

1959年，我幸运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依靠人民助学金维持生活。北大是有光荣传统和优良学风的名校。历史系是成立较早的大系，文化底蕴深厚，人才济济，名师荟萃。其中我对张政烺先生的印象最深。张先生是一个读书万卷、学富五车的笃实学者，有“小王国维”“先秦史泰斗”和“活字典”之称。他教我们先秦史，讲课时引经据典，实证性强，有时还兼及史学界的热点、难点。课下我们不论问他什么问题，他都有问必答，毫无保留。同学们都说他人品好、学问好，对先秦史的造诣尤深。我不禁对他产生了景仰之情。

后来张先生调到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今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我本科毕业考取他的研究生也到了历史所。第一次拜见导师，他以聊天的方式，向我布置了学习任务，先生明确指出，要先读书，打好基础。从先秦的基本史料读起。先读《史记》《左传》《国语》《诗经》，要精读、细读，每字每句都要读懂。在打好基础的前提下，再练习写学术论文。为了帮助我读懂古籍，先生还在百忙中亲自带我到琉璃厂购买了一套线装武英殿

本的《十三经注疏》，字大，又有标点，为我提供了阅读、理解古籍的便利条件。

然而不久，随着“左倾”思潮的泛滥，政治风云突变。就在那年秋季，历史所全体人员“连锅端”去山东省海阳县参加“四清”，我自然也不例外。“四清”结束，就地劳动锻炼，然后就是不堪回首的“十年浩劫”。因此先生布置的学习任务也就成了竹篮打水。我研究生肄业留所工作。

1976年，平地一声春雷，“四人帮”被粉碎，科学的春天来了。历史所的业务逐渐得到恢复。可那时我已快40岁了。且业务荒废多年。先生对我这个老学生依然精心栽培，指点学术迷津。

那时候，历史所恢复了《甲骨文合集》的编订工作。张先生对我说：你去参加《甲骨文合集》的工作吧！写出文章来我给审，推荐发表。可是由于行政上的干预，此事未成。而长期从事《中国古代历史图谱》（以下简称《图谱》）编写这一集体工作，由于文物版权问题等原因，《图谱》编写三上三下，加以不断有新的考古发现，需要更换文物图片及其说明文字，我花费了大量时间和精力，影响了研究工作。

先生对我参与编写《图谱》的指导全面而细致。他亲自拟定提纲、体例，并指定参考书，甚至亲手修改我写的文稿。我每有些微进步，先生必给予鼓励。

先生曾谆谆教导我如何做研究工作。他语重心长地说：学术研究就像接力赛跑，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作进一步深入的研究，“更上一层楼”，最忌讳人云亦云，做重复劳动。为此就要选择那些前人没有研究过，或研究薄弱，而又有大量新材料的题目去作。出土的甲骨文、金文、简帛、陶文都是新材料。研究这些新材料，容易出成果，但必须熟悉先秦秦汉的典籍，等等。他的真知灼见，对我的研究工作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由于种种客观的和主观的原因，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特殊

的时代背景^①，我的研究成果时间跨度较大，涉及的问题偏多。这是需要说明的。

本书中的论文是从已发表的四十多篇论文中自选的，共分三个专题，三个专题的论文自成体系。以下按专题作些简要介绍。

上篇“人物”收入论文12篇，都是评价历史人物的。

《秦国重农政策简论——商鞅秦律与云梦出土秦律的比较研究之一》。将商鞅秦律与云梦出土秦律比较，认为商鞅的重农政策，在云梦秦律中得到反映，且有所丰富和发展，而日益完整、严密。指出商鞅死后秦国依然存在大量奴隶，可见奴隶制的残余还相当严重。

《项羽人格魅力成因试探》。将项羽的人格魅力归纳为威武勇猛，刚毅果决，豪迈慷慨，光明磊落，侠义柔情。并分析项羽人格魅力的三个成因：一、国仇家恨的复仇心理；二、尚武尚勇的文化积淀；三、游侠风尚的熏陶。

《试论王莽改币》。将传世文献材料与考古材料相印证，探析王莽改制的背景、内容、性质和失败的缘由，并试图通过对西汉后期货币发展的考察，初步探索我国封建社会早期的货币规律。本文曾被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指定为秦汉经济史专业研究生必读的论文之一。

《王莽改制若干问题商榷》。本文就王莽改制若干有争议的问题，即评价王莽的依据、《汉书》等古籍中贬抑挾伐王莽的记载、王莽改制的动机、王莽改制的性质和王莽改制失败的原因，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一代才女和史家班昭》。阐述了一代才女和史家班昭的业绩及其取得业绩的原因。共分五部分，即一、出身显贵诗书家；二、

^① “文革”期间，历史所由军宣队领导，政治任务压倒一切。我因“评《水浒》”而涉猎宋史。因派我和其他同志协助已故原故宫博物院副院长单士先生编写《故宫》一书而研究明清史。

受命续撰《汉书》；三、杰出的史学成就；四、卓越的文学贡献；五、影响深远的婚姻思想。

《高俅其人》。本文探析了高俅的发迹、为人、能力及其对北宋军政的危害。指出他的发迹是北宋末年政治腐败的产物。他身上集中了无耻政客的卑鄙性、封建官僚的残酷性和地主阶级的贪婪性。他长期执掌兵权，把北宋王朝推向灾难的深渊。

《明代杰出的建筑规划家阮安》。本文阐述了明代杰出的建筑规划家阮安，在建筑北京和治理黄河上的贡献，以及其廉洁奉公、生活简朴的优秀品质。

《明代优秀的建筑家蒯祥》。本文论述了明代优秀的建筑家蒯祥，在建筑上的成就和贡献，以及他的敬业精神、俭朴作风与社会影响。

《论徐杲——兼及明代的匠官》。在中国封建社会，以工匠身份而被拔擢为工部尚书的，只有明朝徐杲一人。本文总结他在建筑上和水利上的成就，分析他脱离匠籍，超登仕流的原因，澄清他遭诬陷、被罢官的冤案。

《试论明代从工匠中选拔工部官吏》。本文对明代为何从工匠中选拔工部官吏、是否形成制度、标准是什么、有无积极意义、经历了哪些斗争等一一进行探索。已故著名明史专家王毓铨先生认为此文解决了明史上一个问题。

《〈髹饰录〉作者生平籍贯考述》。本文用粗线条勾画出《髹饰录》的作者黄成的生平，并从六个方面考证黄成的籍贯是安徽徽州。

《明代的油漆名匠——兼及明代油漆技术的发展》。本文探索了明代油漆技术的发展，并对明代油漆名匠张德刚、杨坝、黄成、杨明、周嵩一一作了介绍。

中编“城市”收入论文12篇，包括对聚落、城市和园林的研究。

《跨湖桥文化内涵刍议》。本文认为跨湖桥文化内涵丰富，其文化类型独特，并就以下五个问题谈了自己的见解。这些问题是：一、跨湖桥文化的年代；二、跨湖桥的彩陶；三、跨湖桥的独木舟；四、跨湖桥的社会面貌；五、跨湖桥文化在学术史上的意义。

《登封王城岗城堡遗址时代试探》。本文从地望、地层关系、时代范围和文化性质等方面论证王城堡遗址可能就是禹都阳城，并指出都城、档案库、王陵的寻找、发掘和研究，应是以后夏文化探索的重点。

《浅谈春秋战国的城市环保》。本文直面当前史学界研究的热点之一——环境史，认为中国早在春秋战国就已产生了环境的保护意识，初步形成了较为完备的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的理论，在不少地方与现代的生态理论、环保思想惊人地相似。

《略论战国城市与政治、经济和军事的关系》。论述了战国城市与政治、经济和军事的关系。认为：一、那时的城市发展适应了政治和军事的需要，并与经济的发展，其中主要是工商业的发展，互为条件；二、战国城市有郡县城市与工商业城市两种类型；三、战国诸侯国都城奠定了我国古代都城的基础。

《战国楚都郢的几个问题》。对楚都纪南城的防御设施作了探研，并填补了纪南城的建制、布局和建筑技术上的空白。

《战国都城城防体系刍议》。本文从六个方面论述了战国都城城防体系。即一、都城的选址、形制、规模和市里；二、都城城墙的形制和构筑材料；三、都城城墙的纵深配置；四、都城城墙上的作战设施；五、城墙重点部位的加固；六、在都城郊区的要道上设前哨据点。

《汉画所见汉代城市与政治、经济和军事的关系》。利用汉代画像石、画像砖和壁画等图像史料，结合文献记载，从城市与政治、经济和文化关系的视觉研究汉代城市，得出以下三点结论，即一、汉代城市的主要建筑是为维护和巩固封建统治服务的；二、

汉代城市的结构和布局适应了当时的政治和军事的需要，边境城市的军事性质尤为突出；三、汉代城市的发展为经济（主要是商业、手工业）的兴旺创造了有利条件，也促进了边境上各兄弟民族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互市”就是民族间友好团结的象征。

《张衡城市学思想试探》。本文提出了张衡的城市学思想问题，并进行了初探。认为他重视城址的选择；在城市管理上，他主张以礼仪治理城市；在城市生活上，他提倡节俭，崇尚朴素。

《汉唐长安规划比较之我见》。本文对汉唐长安规划从四个方面作了比较，即一、位置、自然条件之比较；二、规模、形态之比较；三、布局之比较；四、城防设施之比较。指出唐长安较之西汉长安，在规划布局上确有显著提高。这是八百年间，在先后兴建曹魏邺城、曹魏洛阳、北魏平城、北魏洛阳的过程中，经过继承、创新的结果。唐长安的规划布局具有匀称、紧凑、分区明确、街道宽直、坊里整饬的特色，对唐洛阳和日本都城平城京、平安京均有深远影响。

《关于明代建筑发展的若干社会原因》。认为明代建筑在技术、艺术方面取得了不少成就，在某些方面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而明代建筑发展的社会原因有以下五点：一是经济的发展，不断向建筑提出新的、高的需求和问题；二是中央集权制度的强化，需要都城和官式建筑的发展；三是建筑材料生产水平的提高，为建筑提供了比较雄厚的物质基础；四是实行解放工奴和“纳银代役”，调动了建筑工匠的积极性；五是从工匠中选拔工部官吏取得了显著成效。

《文源阁与〈四库全书〉》。本文将文献记载与调查材料互相印证考校，并参考当代人的研究成果，对恢复被英法侵略者焚毁的圆明园文源阁的原貌作了尝试；并对《四库全书》的编纂目的、编纂方法以及《四库全书》的内容、造诣和价值，一一予以述评。

《加强城市学和城市史研究》。本文分析了加强城市学和城市